

新旗

撤退美軍與學生運動

振聲

爲了北平一位女生被美軍強姦，全中國的學生舉行一次憤怒的抗議。其行動的一致，口號的類似，以及波及範圍的廣大，竟使那些神經過敏的反動家，又相信這是蘇聯或延安的煽動家所掀起的。

其實，這是太把共產黨的力量看大了，把羣衆的認識看低了，同時把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罪惡的後果看漏了。

誰都明白的，強姦案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引子，其作用最多不過等於引起一場火災的第一根火柴。問題的中心已經由學生示威時所提出的那個主要口號表示出來：『美軍退出中國』。

其實，即使『美軍退出中國』這個口號也只具有象徵的意義，學生們在這個口號中所喊出的，乃是對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軍事，政治以及經濟的全盤控制的抗議。這口號的全部意義應該是『打倒美帝國主義』；而且還不僅此哩，牠更表示着人們對那些假美帝以自固的『自己人』的斥責。

爲什麼人們對美帝及其在華代理人的抗議與斥責會如此一致而普遍呢？誘之於共產黨『煽動家』之手是太愚蠢，說學生被人利用也是太簡單了，主要的原因，乃是：美帝勾結中國反動派企圖奴役中國人民大眾的行爲，已經造成了極其普遍的不滿。

誠然，直至今日爲止，將這不滿表示出來的還祇限於學生，因之，無論反動派或革命派對於這次運動，都對牠表示了輕視：『成了什麼事？草堆上的一把小火！』可是這樣想的人是大大地錯了。學生本身不是一個有決定性的力量，這是不錯的。但問題不在於學生本身。在中國，乃至一般的落後

國家，正如有人說過，學生是『巴力門』，即是國會，也就是說，是真正民意的代表，民意的反映。如果燕子的飛來不就是春的來臨，但至少，這

是個正確的消息，報告你春天快來了。五四運動始於學生，五卅運動也部分地始於學生，近代中國史上每件大事，差不多都始於學生。現在信號又來了，大事變不會很遠的。我們對此次學生運動寄以期望，也願賦以牠應有的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反美運動，許多年青人不知道，好多老年人忘記了，因爲已經很久，在一九〇五年。從那時起，太平洋對岸那個國家，始終是我們的『朋友』。費了多少錢，多少心計；從文化，經濟，政治乃至軍事方面的應用，這位山姆大叔好容易造成了在華的友誼。這友誼到前年勝利時達到了頂點；但在此後的一年內，却將前功斷送得乾乾淨淨。這次學生運動如果沒有旁的意義的話，那末

第十四期目錄

撤退美軍與學生運動.....	振聲
法共與越盟.....	劉默
日本總罷工流產.....	舒嚴
向陶行知紀念委員會抗議.....	本社
我們對『中間派』政治組織的態度.....	鳳岡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上).....	三男
論機會主義者之利用民主口號.....	

Ernest Germain

中國機會主義者與民主口號.....穆德
中國革命悲劇(續).....Harold R. Isaacs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有一點就已經够大了：牠表示出美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的野心已在中國遭到普遍的反對！

現在，這件強姦案已經『結束』，牠得到了『公正』的判決。果如統治者之所願，問題在『法律範圍』內解決了。學生運動呢？也正如反動家們所預料，無聲無息地過去了。但是，牠的政治意義始終存在着，愈過愈會發生影響。參加這次運動的前進的學生們絕對沒有理由為此消極，失望，或灰心。將來，中國工農大眾的反美反統治黨的鬥爭也必然要加劇，配合着這些鬥爭，學生們的鬥爭是有意義與影響的。

不過我們也決不可自滿，尤其要檢討一下我們這次運動的缺點。這次運動是自發的，如果有領導的話，也只是一些左傾的，多少蒙受一點史大林主義的一部分學生吧了。因此，意識上顯然表示得不夠健全，即太偏向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必須認清楚：要在中國施行美帝國主義政策的，不是全體美國人，而只是華爾街巨頭，以及華盛頓的官僚與軍人。美國兵士的大多數是被壓迫與被剝削的勞動者，他們不是自願來華，他們自己就是想回家去的。駐屯在全世界的美國兵士曾經發生過極普遍的回家運動，就可以證明美帝國主義的軍事機構並不是整個的。我們，中國的勞苦大眾，反對美軍留華，主要是爲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而決非反對一切美國人，也非敵視全體美國兵；我們應該將美帝國主義與美軍的普通兵士分開來，應該重新喚起他們的回家運動，響應他們的運動，與這些穿着制服的美國工農一致，共同反對美國的統治階級以及他們的中國代理人。不是中國人對美國人，而是中美的勞苦大眾對中美的統治階層。我們的一切運動必須向這一方針前進。

法共與越盟

劉默

法蘭西帝國主義從希特勒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便以比希特勒的更壞手段對付越南人。法蘭西帝國主義，和其他所有的帝國主義一樣，一再證明出是血腥的，貪婪的，兇暴的，極端無恥的。他們在戰爭時期一切關於自由民主或獨立解放的甜言蜜語，連半文小錢都不值。我們，同樣是被壓迫民族的羣衆，自然完全同情越南的獨立鬥爭，反對法蘭西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

不過我們不願意停留在這樣一個起碼的態度聲明上。我們需要從這個事件理解得一點東西。我們要從法共與越盟對民族獨立戰爭所取的角度來觀察二者的性質。

法國共產黨現在是聯合政黨的構成分子，牠國會中占着最大多數議席，該黨的領袖担任着副總理，國防部長，勞工部長等等要職。無論從法理或事實上講，法國共產黨是要對越南的罪惡負責的。一個以『共產主義』爲名的政黨，如何能够負責執行對殖民地的侵略呢？只此一點，已足以說明法國共產黨，業已墮落到什麼地步了！

誠然，法共『批評』政府的越南政策，主張與越盟政府『和平談判』。但這顯然是一種偽善，一種欺騙。法共在國會中表決了龐大的針對越南的軍事預算，牠的部長沒有因越南侵略而辭職，牠的領袖反而接受了國防部長的重要位置……這一切，使共產黨議員加香在國會中的『批評』成了最可恥的掩飾；同時，法共沒有主張越南的無條件脫離法國，而主張什麼『和平談判』，這樣便使法共成了法帝國主義最狡猾的一個代言人。

列甯以及革命共產主義的整個傳統告訴我們：

宗主國無產階級革命者，爲了反對本國帝國主義，必須主張無條件放棄殖民地。讓殖民地獨立，不管那殖民地正在與將在何國人的統治之下。

法共主張以『和平』方法保持殖民地，實際上是要以更聰明的方法保持殖民地，以更聰明的方法保持帝國主義服務。多麼徹底與驚人的墮落！

現在讓我們來看越盟方面。如果我們從越南無產階級的立場看越盟的領導，那是一個壞領導，準備出賣的一種領導。越盟是新的『四階級聯盟』，是越南的『人民陣線』，越南版的『聯合政府』。牠以『共產黨人』胡志明爲主席，以退了位的保大帝作顧問。越南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客顯然在這中間占了支配地位，甚至越南的地主階級也起着一些作用。現在，不錯，正是牠領導着越南的廣大民衆，在和法帝國主義的武裝隊作着生死之鬥。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領導是極不堅定的。祇教法帝國主義肯聽牠本國『共產黨』部長的勸告，與越盟進行和談，替越盟領導者的越南資產階級保持了相當獨立的統治地位，越盟便十分願意以『一個單位』資格，加入法蘭西帝國去的。越南的工人，農民，以及一般的勞苦羣衆，自然不該祇爲了這樣一個資格而流血，他們要的是越南的完全獨立，土地關係之完全改變，一般民衆生活之徹底提高；可是爲了這，必須有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獨立政黨，由牠進行獨立的政策，藉以建立越南的工農政府，解決民族獨立以及其他一切的民主問題。

現在越南共產黨自動解散了，那裏沒有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的與革命的黨。越南人雖在進行英勇的解放戰爭，但越盟的政策——實際上是越南史大林主義者的政策，却正在重演中國的悲劇。爲要避免這個命運，一個重大的責任落在越南第四國際支部的肩上了。

一月二十三日

日本總罷工流產

舒嚴

上月底，我們正在期待一次八百六十萬人的總罷工，不僅是日本罷工史上所未曾有過的，而且是全世界罷工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可是，忽然，這總罷工不能舉行了，因為佔領軍總司令麥克沃塞下禁止。

與標榜的目的相反，在日本的盟國佔領軍，可見并非爲了扶植日本底民主運動，而是爲了制止日本勞動者底要求，爲了幫助日本資本家和地主去鎮壓日本工農革命。自從前年九月開始佔領以來，麥克沃塞已經不止一次向我們顯示美國帝國主義佔領日本的「個真實的目的」，但顯示得最明白的，還是此次的禁止總罷工命令。

我們記得不久之前，美國有一次大規模的煤礦工人罷工，可是被華爾街代辦人杜魯門所撲滅了。此次，日本總罷工，也是被華爾街另一個代辦人，麥克沃塞，所預先撲滅了的。

沒有比這二件事情更明白告訴我們：這兩個曾經互相作戰的國家，其被壓迫階級是利害一致的。華爾街大亨們正在日本培植一批恭順的僱僕，好替他們剝削日本勞動大眾。日本資產階級，那些曾經稱雄一時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戰敗之後，也甘心以華爾街僱僕自居，希圖分沾剝削餘潤來維持本階級之存在了。

華爾街在日本及其他國家有了這批僱僕之後，美國工人是難得翻身的，反之若非美國工人在這資本主義最強大堡壘中施行政命的打擊，各國工人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羣衆，也很難獲得解放。

美國工人必須要求美軍從日本撤退，以此援助日本兄弟底鬥爭。因爲大戰終止後已有一年半了

我們對中間派政治組織的態度

鳳岡

有些同情的讀者，讀了我們在上期本刊上關於「中間派的一次考驗」的文字，向我們提出了如下疑問：「理論上你們對中間派所作的分析是完全對的；不過你們總忽略了中間派上層分子所領導的民主政團的進步作用，你們太把眼光集中在工農身上。太愛極端，太愛徹底，以至犯了教派毛病，忘記了一切中間性的與半途性的運動之革命的或進步的作用。」

還有少數讀者，對我們提出了責難：「你們對民主派採取了如此嚴格的態度，簡直是拆民主派的台，因而是客觀上幫助了反民主的統治黨派。」

爲此，我們必須以明白而不容誤會的方式，說明我們對民主派政團——目前主要是民主同盟——的態度。

中國，不管現在是召集過所謂「國大」，而且欽賜了什麼「憲法」，但是沒有人能够否認，我們老百姓是連最起码的民主權利都沒有的。因此，一個迫切的與十分普遍的要求發生出來，人們要爭到一些起碼的民主權利，例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與罷工的自由；人身的安全與保障，生活保障與獲得等等。同時也因此，無論誰，無論那一個個人與那一個團體，祇叫他或牠爲這些權利而鬥爭，便都是我們的朋友，至少是我們在某一段路程上的同路人。民主同盟既然是一個「爲民主」的組織，當然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友人」。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過去一切鬥爭經驗告訴我們：在分成階級的現社會中，各階級的成員及代表們對於某一目標的態度，即使在某些條件之下達到了形式上的同一，但在同樣條件下，尤其當條件改變之後，這個同一的態度是有着極異的實質的。拿民主要求來說吧，現在在中國，從某些放下了屠刀的將軍起，中間經過一部分資產階級，大部分城鄉小資產階級，城鄉貧民，一直到無產階級，都要求民主；但是，你假使問問他們各人對此等要求的了解，所欲達到的程度，尤其是，願意用來達到這些要求的手段，那就是各人有各人的見解與說法了。其間相去的距離之遠，其實比民主與反民主之間的相隔也差不多哩。一些將軍與大人先生，所要的多半不過是失去的權勢與地位，此外都是幌子；那些資本家們，所要的是參加「國營」事業的權利，向國家銀行借款的自由，其餘便都是陪襯；某部分小資產階級，所求者是天下太平，安居樂業，而貧民與工人大衆，則想變更一下現有制度，使他們能過最低限度的生活，能有存活下去的自由與保障。說到手段呢？當然也跟着不同了：上焉者，希望獲取「民主」於航籌交錯之間，於密室耳語之中；中焉者，希望循協商道路，聯合政府，使中國走向和平民主的大路；下焉者，則本能地覺得，除了本身的團結與力量，憑此力量以進行革命，此外根本無法獲得絲毫民主或自由。

民主陣營內如此複雜的成分與要求，是否能由一個政治組織來體現來領導，並由此達到成功呢？我們的回答是絕對不能。

現在的民主同盟是否包括了我們上述的成分，我們不知道；但即使包括了，也絕不能體現所有這些成

現在佔領軍底作用已經明顯不是爲了防止過去的敵手再起了，是爲了防止工農大眾革命，或者爲了準備第三次大戰。日本工人則應與佔領軍兵士聯歡。因爲禁止罷工的，是華爾街，而非這些穿軍服的勞動者，他們的利益，最後分析起來，是與日本工人利益一致的。

向陶行知紀念委員會抗議

民主派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逝世，本社社友一男君曾在本刊第六期上撰寫『敬悼陶行知先生』一文，表示悼惜之意。後來陶行知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關於陶先生逝世之紀念文字，將三男君的文章收入，我們自然祇有歡迎的。不過，最近我們看到市面上發賣的『陶行知先生紀念集』中，三男君的文字（見該冊第五十三頁）被用白紙貼去數行，貼去的文字如下：

『且不管美蘇之間的沒有外交關係，他親自去了莫斯科；後來，蘇聯發生了變化，統治的官僚層把整代的革命元勳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槍殺了，這位老先生又出來組織調查團，替這些革命家伸冤；此次戰爭中，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的十八個領袖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被捕……』

我們不難明白人家爲什麼要貼去這幾行，也不難知道貼去這幾行的是誰的手：誰害怕人提起莫斯科冤獄，誰害怕人提起杜威博士在反對此冤獄時的功績呢？這太清楚了，無需我們特別指明，同時這種書報檢查也太蠢了，這是『欲蓋彌彰』。不過，我們仍不能甘於緘默。因爲陶先生是民主主義者，而陶行知紀念委員會諸人又都是爲民主而鬥爭的，他們當然主張『言論自由』，我們不得不就站在這個起碼的民主權利上，向他們提出抗議。

分的要求，更不能代表所有這些人的利益。就目前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張及其領袖分子言，那決不是『全民的』，不是各階級的，而是十足是資產階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過去論中間派的文字中詳細說過了）。一個政治組織，其中參加着各階級的人，但在思想與組織上完全受一階級的領導與控制，那牠便是這一階級的黨；對民主同盟的情形言，即是資產階級的黨，而非各階級的黨。這個資產階級黨的內部如果包括了大量的資產階級與工農分子，決不是平等的合作者，而祇是資產階級政治上的苦力與下屬。

因此，縱使民主同盟正標榜着爲中國所需要的民主，縱使牠內部包含了廣大的勞苦羣衆；可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派，却在政治上不能擁護，組織上不能參加。因此我們，雖然在抽象的爭取民主這一點上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似有共同之點，但若細按內容以及鬥爭之道，我們與他們是十分不同的，在許多地方竟是完全相反的。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權利比民主派所要求的要無限地深且廣，我們所採取的爭民主的方法比他們所採取的要無限地堅決與徹底。換句話說，我們的民主目標是：工農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完全解放，我們的鬥爭方法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來爭取保障民主權利。

我們深信：當世界上的民主老家都正在喪失民主權利的今日，當世界上的主要資產階級正趨向於集權獨裁的時代，我們這半殖民地從無民主傳統的中國要想實現一個古典型的民主國家，乃是一個可憐的幻想；同時我們又深信：中國和全世界一樣，要爭取，乃至保存這些在先進國中業已實現了一二百年或數十年，而現在却被逐一剝奪的寶貴的民主權利，祇有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纔有可能了。

根據於上述的所信，我們不擁護民主同盟，因爲牠正是幻想以和平方法由資產階級領導來實現一個民主國家的，同時也根據上述所信，我們不參加民主同盟，因爲我們要以獨立的組織與旗幟，使一些正做着資產階級政治苦力的大衆覺悟過來，改隸於他們自己的政派。

不過我們不擁護民主同盟，並非就是『打倒』之意；不參加民主同盟，亦非任何時都拒絕與之共同行動之意。

我們非但不要打倒民主同盟，甚至還是願見這個組織之產生的。因爲無論如何，牠總反映着中國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表示着廣大小資產階級政治上對國民黨的不滿，又表示着中國占有階級內部的分化與破裂。

我們不參加民主同盟（當然民主同盟不要我們參加又是另一問題），却願意在許多場合跟牠共同行動。對於民盟內部乃至民盟周圍的勞苦羣衆，或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民主要求及其鬥爭，不用說，我們是竭誠同情，願與之肩肩作戰的；就是民盟（包括其他民主派）的上層，那些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客們，祇叫有任何認真的行動，在民主鬥爭上祇叫不是簡單的欺騙，因而能多少打擊目前的反動統治的，我們也是同情的；不過我們是用自己的方法來同情，用獨立的行動來合作，詳言之，那就是，我們要批評其不足，說明其限度，揭開其偽飾，暴露其動機，同時，我們要用更堅決與更徹底的革命鬥爭，以便加深以及接替那一時在他們領導之下而終必爲他們所叛離的民主運動。

我們此種對民主同盟以及其他羣衆性的民主政團的態度，當然與『教派』無緣，也決未『忘記了中間性與半途性的運動之革命的或進步的作用』。至於說『客觀上幫助了反民主的統治黨派』，那更是不知所云了。

「聯合政府」問題答客問(上)

三男

問：因為中共提倡，民盟贊成，現在中國的最大多數進步人士，都認為要解決目前中國的僵局，唯一辦法是由各黨各派成立聯合政府，代替目前的一黨政府。獨有你們反對，究竟爲的什麼？

答：這問題似簡單而複雜，我們不妨從從容容打各方面來談。第一點應該指出的：各黨各派之所以贊成，我們之所以反對，根本原因在於：牠們都是妥協主義的與改良主義的政黨，我們却是奉行革命主義的。

問：爲什麼贊成聯合政府便是妥協主義與改良主義，反對聯合政府便是革命主義呢？現在國民黨不是連聯合政府都不贊成嗎？如果國民黨被逼成立聯合政府，如果革命黨願意參加進去，憑政府內外的羣衆壓力，使反動者逐步退讓，終且失却一切地位，同時革命黨就利用政權，一步一步實現出革命政綱來，不是一樣地達到革命目的，而且更安全地達到了嗎？

答：你這種想法是完全誤解了國家的本質，你把國家或政權看成了一種超階級的東西，看成了一個簡單的工具，誰拿到手誰就能利用的一個工具。同時，你又簡單地把政權看成爲幾個部長的位。據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同時國家的力量是包括着政府，軍隊，警察，以及一切經濟與文化的制度的。所以政權或國家不是一種與階級鬥爭無關，或立於階級鬥爭之外的工具。牠是一種工具，但牠是操在統治階級手裏，由此調度着國家中的一切力量，用以鎮壓一切被統治階級，因而與統治

階級無法分開的一種龐大複雜的工具。被統治者爲要推翻統治者，如果不以變更幾個個人的地位爲限，而欲根本變更社會制度的，那就不能簡單地把這具從統治者手裏搶過來應用就算。必先推翻這統治，必先徹底打碎這工具——這架舊式官僚剝削的工具，然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由被統治者治理舊統治者的國家工具。

所以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再加上列寧的發揮，特別給我們指出了一點，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被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加以摧毀，然後再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國家。一切妥協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僅僅因爲忘記了這一個教訓，以爲不經過革命，但由和平改良，議會鬥爭，最後經過聯合政府，無產階級是可以獲得政權，而且可以使資產階級的國家變成爲無產階級的國家，終且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使國家根本消滅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派與馬克思主義修正派（第二國際諸黨），二者在這一重要問題上的意見不同，實際上發生了兩個不同的結果：前者完成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後者則斷送了無數次的革命，現在墮落成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忠實的代理人了。

第二國際所屬那些妥協派數十年來的所作所爲，已經把你的疑問答覆清楚了，要想聯合政府的策略，使資產階級的國家逐步變成爲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種反動的幻想了。

問：不錯，歷史確實給了我們這樣的證明，要建立社會主義性的工人國家，非先用暴力革命來摧

毀資本主義的官僚國家不可，列寧信守這學說而得到成功，妥協派則因排拒了這學說而失敗而墮落。但我覺得，如果把「聯合政府」當成一個策略，配合在整個的革命戰略之中，不是有利而無害的嗎？至少，我們不能一概排斥的吧？因爲我覺得，妥協派之失敗與墮落並非由於「聯合政府」，而由於他們整個的妥協政策。所以我認爲，聯合政府這口號的本身並不能決定牠是革命的抑是妥協的性質。問題在於究竟是革命黨抑是妥協黨在應用這個口號。

答：你把聯合政府這策略與妥協政策分開來是不對的。實際上，聯合政府口號祇是妥協政策的最高表現，是妥協派在國家問題或政權問題上所取的態度。所以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不管牠主觀上是如何想要取得政權，以便實行社會主義，祇叫牠在政權問題上採取了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態度，那末牠的整個政策或戰略都是妥協主義的了，也就是說，牠再也不會領導工人階級執掌政權，更談不到實行社會主義了。

問：爲什麼？

答：因爲資產階級的國家既然必須在羣衆的暴力革命中被摧毀，那末革命黨的任務，牠的任務中的任務，就在於依據階級鬥爭的精神，去組織羣衆（主要是工人階級），教育羣衆，領導羣衆，使他們發生極其明確的階級覺悟，使他們對資產階級的統治者生出不可調和的階級仇恨，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採取毫不妥協的敵對態度。祇有這樣，在各種有利條件湊合的時候，革命黨才能率領羣衆起來，一舉而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建立自己獨立的政權。可是聯合政府這政策呢？如果能有一點作用的話，祇能癱瘓工農大衆的階級覺悟，促成他們對政府和平轉讓的幻想，鬆懈他們從

事暴力革命的決心。所以列甯對於『聯合政府』口號，下過一個十分正確的定義：這是資本家政府，在『地位不穩的時候』，用以『迷糊，分散並最後克服工人階級的一種方法』。這是一個陷阱。一個工人政黨，不管你主觀上如何革命，一旦落入這個陷阱，你便自然而不能革命了。

問：你的話很有道理，不過我還嫌空洞。原則上說，聯合政府會迷糊階級意識是對的，但是事實往往不這樣簡單。革命黨部分取得政權總比毫無政權好些，革命黨拿取了部分政權，利用這個工具，不更可以去教育工人羣衆，更可以發展階級鬥爭嗎？所以，我覺得，聯合政府的優點可以克服牠的缺點。

答：你這話才是空洞而不合實際哩，而且是十足的唯心的。首先，你應該知道，『最雄辯的是事實』本身。革命黨以身作則，自己和資產階級聯合了組織政府，這樣一來，憑你用多麼動人的論據，多麼激烈的宣傳，也不能叫羣衆相信『階級的絕對不能調和』了。其次，革命黨如果推派代表參加了資產階級的政府，這時候，如果整個的社會制度還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貴族的，那末這幾位『取得了部分政權』的革命黨的大臣或部長們，不僅不能利用這點子政權來『教育羣衆』，『發展鬥爭』，而且突然間踏進了最舒適最優美的上流社會的生活，立刻會腐敗了，屈服了，不管他們是何等樣的出身，這時候也會軟綿綿地坍塌下來，自居於紳士與政治家之列，特別賣力地來幫助統治階級鎮壓反抗起來的被壓迫階級。英國的麥唐納先生與目前艾德禮或貝文先生，將這點特別表演得透徹無比。總之，不由一次徹底的社會革命將整個國家與社會來一次天翻地覆的改變，那末幾個革命黨人的參加政府，不是自甘

墮落，便是被逼做了俘虜。

問：你這話如果把整個局勢假定爲平靜無事，當然是對的；可是平靜的局勢決不會發生聯合政府。一個國家需要組成聯合政府，總表示那國家已發生了革命或半革命，換句話說，革命黨人參加政府，只是革命與反革命形成了相持局面的一種結果，這時候，革命勢力已經很大，但尙不足以取得全部政權，而部分政權却已經能够取得了，羣衆逼他們走上政權，革命黨於是接受了部分政權，這時候，羣衆決不會將取得部分而非全部解釋作妥協，同時參加政府的代表，也決不敢自己墮落，對資產階級投降。這是把鬥爭擴大到政府內部，從此上下配合，不是更容易推進革命，奪取全部政權，因而完成革命嗎？

答：你這話似是而非。資產階級，或一般的統治階級，需要其他階級的政黨，尤其是工人政黨的代表來參加政府，當然是被逼出此。這是對的，我和你同意。不過問題不在這裏，問題的要點在於：到了這個時候，對於革命的利益說，革命黨應該接受聯合政府呢，還是應該拒絕牠？這是個實際意義較多於理論意義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妨用事實而不用論據來說明牠。列甯說：『資本家們：鑒於政府地位不穩，便藉助於一種方法，這方法自從一八四八年以來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們是一再實行的：這就是所謂『聯合內閣』，由資產階級分子與社會主義叛徒混合組織的。在某些國家，其中政治自由與民主政制曾經和工人的革命運動同時存在過的，例如在英法，資本家利用這騙術得最成功。』（見『革命諸問題』）這裏的話說得很明白：自從一八四八年以來，歐洲的資本家政府每當不穩的時候，總是拿『聯合政府』這個騙術來欺騙革命民衆，每次都利

用得很成功。爲此，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俄國『社會主義者』和資本家成立了『聯合政府』的時候，列甯大聲疾呼，叫布爾雪維克派絕對不要受這個欺騙，要對羣衆說：不要給臨時政府以半點信任，繼續發動羣衆革命，繼續激起羣衆對『革命的聯合政府』的仇視，由此積蓄革命力量，等到十月底，便舉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完成了革命。現在讓我們假定一下：如果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接受了聯合政府，與克倫斯基共同執政，譬如說，列甯分得了勞工部長一席，那末羣衆還是會對克倫斯基政府發生幻想，因而停止革命呢，還是會對列甯也參加的聯合政府發生增長增高的敵視，因而推進革命呢？當然是前一情形，十月革命因此也決不會產生的了。

所以問題是極清楚的，如果當革命與反革命的相持局面促成了聯合政府，總祇有使革命停頓，受騙；而絕不會使革命繼續前進，使羣衆格外清醒的。一部分革命黨人加入了政府，反革命與革命雙方都有意無意造成一種印象：『革命已經成功了』，未完成的工作以後祇叫交給『革命政府』去辦好了，這樣，革命羣衆的努力自然鬆弛下來，靜待革命新貴們和資產階級代表在內閣會議的客廳中，客客氣氣去解決一切革命任務，而實際呢，那個被逼組成了聯合政府的統治階級，正利用着這個節日的昇平氣象，步步加緊在暗地裏佈置力量，部署反攻；慢慢地，等到革命黨人的信用逐漸破產（一定會破產的，因爲這些新貴事實上只是舊統治者的裝飾品），羣衆的反叛熱情逐漸冷却，或者，下層羣衆的不滿已被引導去主要反對妥協領袖的時候，他們便實行反攻了，一腳踢開了『聯合政府』，用赤裸裸的獨裁來鎮壓迷惘的革命羣衆，連帶也打擊那些『新貴』。

這一切都不是我憑空設想，近百年來西方的革命史，已經以太多次數，太多代價告訴過我們。問：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業已解決了他們的歷史任務，所以他們是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妥協派想和這樣的資產階級去組織『聯合政府』，也許會釀成如你所說的壞結局；不過中國是一個落後國家，這裏的資產階級還不是十足的統治者，牠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方面受着封建舊勢力的壓迫，所以牠還是可以起革命作用，至少也可以起進步作用的。資產階級的這一個進步作用，決定了中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進步性，甚至必需性。

答：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要補充一點。我說近百年的西方革命史給了我們許多關於『聯合政府』的反證。我這話沒有說完全。因為在東方，尤其在中國，你所說的落後的中國，正有過一個最好的例子。那便是一九二七年夏季的武漢政府，這是一個『聯合政府』。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和代表農工的共產黨組織起來的。結果怎麼樣呢？爲了這個『聯合』，共產黨壓制了工人鬥爭，自動繳了湖北總工會的械，同時遏止了兩湖廣大而深刻的農民土地革命，以此加強了反革命的力量，促成了甯漢合作，斷送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這不是一個很新鮮的史例，證明出『聯合政府』在中國也不能起什麼進步作用嗎？

一九二七年的武漢聯合政府，就是以『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作根據的。那時候的第三國際，由史大林一系控制着，已逐漸失去列甯時代的革命精神，在許多基本問題上回到了第二國際的立場，所以牠指導中國革命的政策。就是叫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擁護國民黨；共產黨人信奉三民主義，不打出獨立的旗幟，在革命進程中不提出

蘇維埃，命令共產黨人加入國民政府，這一切都是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而這個『革命性』的來源，則就是你所說的：『中國資產階級受着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內外夾攻』。

歷史替我們證明得清清楚楚，一九二七年的聯合政府給我們帶來了多麼大的災害！

其實在當時，第三國際中另一派，繼承着十月革命的列甯傳統的，以托洛次基爲首的左派反對派，早就及時地指出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所謂革命性是靠不住的，因爲中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之間，即使在理論上有矛盾之處，但事實上却有不可分離的血肉關係。所以他們祇當工農大眾簡單做着政治上苦力絕未起來爲自身利益而鬥爭的時候，才肯對帝國主義與落後勢力表示一點革命姿態，等到工農鬥爭一興起，自覺的程度一提高，因而相當妨礙一點資產階級的利益時，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面貌便立即露出來了，立即與帝國主義及落後勢力構成了三位一體，而且自居於先鋒與領袖之列。根據了這一認識，當時的第三國際左派反對派便主張了一條不同的中國革命路線：退出國民黨，共產黨絕對獨立；組織蘇維埃，退出國民政府。

現在我們事後想想，如果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左派反對派的路線，即使中國革命仍舊不成功，也決不會一敗至此的。

史大林們要等到工農大眾成千成萬被殺死在血泊中之後，才宣佈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沒有『革命性』了，這是愚蠢的，但還可以原諒，因爲能憑理論的力量來預見的人畢竟占着少數。到了一九三六年左右，因爲國民黨資產階級對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了比較強硬態度，史大林派就認爲中國資產階級又有革命性了，因而又提出了聯合政府的

口號，那纔是不可原諒的。中國資產階級誠然迄今仍未解決其歷史任務。即：民族獨立與土地革命，可是牠已經和西歐先進國的同類們一樣地反動了，而且已經是國家的十足統治者了。牠與其說受着帝國主義與落後勢力的壓迫，倒毋甯說牠的存在是靠着帝國主義的保育與落後勢力的支持的，因此，牠非但不能再解決什麼歷史任務，而且成爲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妨礙者了。我們怎麼可以向牠提議組織聯合政府，企圖解決國家問題呢？

問：這一層我給你說服了。不過還有疑問。在先進國家，工人階級數量多，力量大，能够單獨組織政府；可是我們中國，據粗疏的統計說，全國的產業工人連同家屬也祇共二百四十五萬左右，約占中國全國總人口的二分之一，這比數是太小了，力量也太小了，牠非但沒有力量單獨組織工人政府，而且也無力領導城鄉貧民組織工農政府。因此，我覺得，共產黨與民主同盟主張由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工人共同聯合組織政府，總不失是實際的有效辦法。

答：我們，中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曾主張單獨由中國的少數產業工人專政。我們從來主張的，乃是中國必須建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工人與城鄉廣大貧民的政府。如果你弄清楚這一點，那就請你先從數量上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吧：工人，城市下層小資產階級與貧民，加上鄉村中的中農，佃農與僱農，數目可不小呢；我們毫不需要誇大，他們已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這樣一個龐大力量，如果組織起來，在正確的領導之下，難道不能建立一個最堅強的革命政府嗎？你自然會如此說：如果組織得起來當然是好的，可是工人階級力量小，無法把這個龐大力量結合起

來，更如何談得到領導呢？你若這樣想那是因爲簡單停留在數量的估計上了。社會階級機構的力量，其結合以及其相互關係，那是由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來決定的。無產階級是否能夠領導廣大的城鄉貧民在他後面，以便建立工農政府，不是由無產階級的絕對力量來決定，倒是由廣大的城鄉貧民，尤其是鄉村貧農的地位來決定，再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二者對未解決的民族民主任務的態度來決定。這個意思如果用更明白的話來講，那就是：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有多少，並非能否建立工農政府的唯一條件；落後國家的工人當然比先進國家的爲少，但因這些國家中沒有完成民主任務（民族獨立亦爲民主任務之一），又因爲資產階級非但不能解決這些任務，而且因種種鬥爭的結果，成了解決此種任務的妨礙者，所以無產階級的鬥爭。能夠和城鄉廣大貧民的爭獨立與爭土地的鬥爭結成一條戰線，形成決定性的力量，能夠建立不但打倒帝國主義與地主，而且能打倒資本家的一種政權，就是社會主義性的工農政府。這樣一來，落後國家弱小的工人階級，反而可以比先進國家的遠較強大的工人階級，更早日走上政權了。說明這個關係的一種學說，就是不斷革命論。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便是這一學說的歷史證驗。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敗，正是因爲第三國際的史大林派否定了這個學說，因而妨礙了不斷革命的事實上展開。

問：照你說，落後國家的特殊階級關係，反而使無產階級能夠與廣大的勞苦羣衆相結合，而且能夠領導他們建立政權；這層道理，我無法反駁；不過問題的另一種看法我總覺得也不能不加以考慮，那就是中共與民盟的一種看法：因爲中國落後，無產階級力量小，同時資產階級，至少是一

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是對現存制度不滿的；所以爲要打開中國目前無出路的現狀，由工人起，經過農民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直到民族資產階級，形成一條聯合戰線，組成聯合政府，總不失是一個現實辦法。我又覺得，從這個辦法再進一步，由聯合政府變成工農政府，這是一條順路，捷徑，至少是穩坦的道路。

答：你這話又回到我們談過的地方去了。譬如關於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由聯合政府和發展至工農政府等等。這些問題，我不再答覆了。此地我祇想給你解釋一點，就是：爲要補救無產階級數量上的弱點，應該對資產階級採取什麼政策？中共說，應該和資產階級合作，聯合，要這樣纔能解決國家的當前的問題。其實我們稍加考慮，便可以發現這路線的叛變性了。這裏我們不談歷史。我祇要問，中國的城鄉貧民大眾，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還是矛盾的？中國的城市貧民，如手工業者，店員，苦力以及一般的薪給者，是否和資產階級在利益上一致呢？他們如果一旦起來了，想謀得自己地位的改善，第一個和他們發生利益衝突的是誰呢？不是那些廠主，店東，債主，即一般的資產階級嗎？再看鄉村方面，那些貧農，即僱農與佃農，如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不是首先要和富農，地主，高利貸者乃至鄉鎮行商的利益相衝突嗎？中國的地主，不是大多數就是高利貸者與商人嗎？換句話說，中國地主與資產階級是大多血肉相連的。那末我現在要請教了，工人階級和他們的代言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在資產階級與城鄉貧民大眾之間，如何調和其利益呢？聯合前者必須失去後者，聯合後者則必須失去前者，兩者是不可得兼的，——可是，目前中共的聯合政府政策，正是

要把水與火聯合起來，使他們共存共榮哩，結果，自然不必說，是水澆滅了火，幫資產階級鎮壓了工農大眾。

問：那末，依你說，工人階級聯合了并領導了城鄉貧民大眾，可以建立工農政權；但中國是如此落後，中國目前所患是『寡』而非『不均』。難道竟可以妄想建設社會主義嗎？

答：你這問題雖然與我們所討論的聯合政府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很願意答覆你。我們說，落後國家的工人革命，配合了城鄉貧民的鬥爭比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反倒可以較先走上政權，這絕對不是等於說：落後國家的經濟條件比先進國家的更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不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甚至，無產階級爲掌握政權而鬥爭，此事本身就已經是社會主義性的革命了，但牠完全不等於，也完全不保證，這個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可以關起門來，在一國範圍內，以一國的生產力爲基礎，實行建設社會主義以至於成功。這不但是幻想，而且是反動的幻想。奪取政權，一國的工人國家配合了另一些被壓迫階級的鬥爭，是可以的，十月革命正是如此奪取的，可是建設社會主義，像俄國那樣，尤其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却決非一國之力所能成就，這是個國際任務。必須在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影響與幫助之下，方才可以成功。中國如果建立了工農政權，一定會給美國，日本，乃至蘇聯的無產階級以甚大的革命推動，（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就，多半也是在日本或美國革命的影響之下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回過來可以幫助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祇有在中國成爲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一員的條

件下，才是可以思議的。

問：你這樣說，我倒更覺得聯合政府的必要了，

答：這話從何說起？

問：因爲照你說，中國即使工農政府成立也還是談不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那不是白費力氣嗎？爲什麼不可以捨遠取近，與資產階級聯合，共同發展資本主義，提高生產力，以便在更高的歷史階段上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呢？

答：答覆你這問題之前，我先要說清楚一個誤會。

我說即使中國成立了工農政府也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我的意思不是說，中國工農政府即使成立也是無事可做，或無事能做；不是的，中國的工農政府能够解決許多問題，而且祇有這個政府，能够解決中國當前的一切難題，其中主要的是：民族獨立與土地革命。此外，這個政府還能像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一樣，採取許多社會主義性的辦法，如生產交通工具，銀行以及土地等等之收歸國有，藉以保證國家之走向社會主義；不過要使社會主義建設完成，那無論從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看，都不能在一國範圍內達到的。因此，國際主義的革命者認爲：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若得某些有利條件的配合，首先得到了政權，則主要應該把牠看成爲發展世界革命的工具，而非自足的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工具。列甯與托洛次基是前一見解的代表，而史大林則是後者的發明者。目前蘇聯的墮落，以及蘇維埃官僚對於世界革命所犯的種種錯誤與罪惡，不少也就是這一見解造成的。

做過了這點說明，我可以答覆你提出的問題了。照中國史大林主義者的說法，中國的現統治者，即那些買辦，官僚，地主，資本家，是連中國的資本主義都不能發展的，他們阻礙了中國生產

力的發展與提高。這話沒有說錯；不過他們又說：如果由共產黨，與國民黨組織了聯合政府，便可以發展資本主義，可以造『富強而幸福的新中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錯在那裏？錯在他們認不清時代。我們現在所生息的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是帝國主義打完了牠第二次大戰的時代。在這時代裏，超帝國主義的傾向與社會主義的傾向這兩個主流在互鬥着。美帝國主義代表着第一個傾向，另一方面各國無一階級則不自覺地，少數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則自覺地代表着後一主流。中間的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則動搖於二者之間，牠以各國的民主派與蘇聯的官僚派及各國的史大林派爲代表。在這時代裏，超帝國主義的傾向是如此的強烈，牠要吞併全世界，組織全世界，要把全世界置於華爾街的統治之下，。在這個時代裏，如果社會主義的歷史負担者，即各國的無產階級，不能及時地覺悟到自己的使命，起來爲整個人類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由此推倒帝國主義，摧毀資本主義，因而阻止美國那個超帝國主義傾向的前進，那末這個傾向在不久將來，就將掀起一次新的人類大屠殺，牠將不但消滅蘇聯，而且要使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英法等，成爲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庸；牠不但將消滅所謂『新民主主義』，而且也要消滅舊民主主義的一切優良傳統。因此，我們說，目前整個人類的命運置於這樣的抉擇中：或者是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是第三次大戰，或者是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或者是超帝國主義的野蠻統治。中國能否自立於這個總抉擇之外呢？是否可以靠『聯合政府』的力量，造成一個既不做美帝殖民地又不做社會主義聯邦之一的『富強而幸福的新中國』呢？請你想想好了，那個老帝國主義的盟主，大英帝

國，現在也掙扎於殖民地命運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我們這落後的中國，反而能造成奇蹟，說祇叫組織了『聯合政府』便可以締造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國，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所以我們認爲，要提高中國的生產力，中國已無法經由資本主義的方法，而必須採取社會主義的途徑，爲此，中國必須建立工農政府，不是聯合政府。

國情的秘密

壽

關於『國情』問題，因爲美國一位學者說起了『內閣制不合中國之情』的話，引起了中國許多學者的嚴正指責。例如蔡尚思先生，戴文葆先生，甚至以保守著名的大公報，也對此說了些頗爲正確的話。我們自然同意這些先生的意見，尤其是蔡尚思先生的，他說：『國情說是少數的實力者，野心者，落伍者，腐敗者最得意而又有力量的一種藉口，其用意與目的，是在乎可以由自己一人，一派，一個性別，一個階級永久包辦獨佔下去。就政治方面來看，例如在清末：實行君主專制的西太后，痛斥康有爲梁啓超等的主張君主立憲制爲不合國情；康梁等又斥光復派民主派的理論爲不合國情。到了民國：北洋軍閥痛斥國民黨的民主理論爲不合國情，國民黨又痛斥在野黨及其一般民主理論爲不合國情。』這話說得真痛快，直透徹，不過他還沒有說完全，我們這裏得替他添上最後一節：『半在朝的中共則斥托派及其主張的社會主義革命說爲不合國情。』

中國機會主義者與民主口號

下面，Ernest Germain 同志反對機會主義的文章，我們譯載出來，不僅因為這篇文章本身很重要，而且因為牠恰好打擊了中國近日抬頭起來的一種機會主義傾向。這傾向由來很久了，但近日更加猖獗。我說的，是某雜誌最近一期座談會，關於『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所代表的傾向。

Ernest Germain 同志說得很好，他說：

『在列甯主義者看來，民主口號不過是動員勞動階級用的一些工具罷了。機會主義者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號問題。他們說，「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尚未提出議事日程」，或「已退出議事日程」了。最好是「這幾年間不必去空談牠」，而應轉向於「更具體的」問題。其次，這些「更具體的」問題切不可時刻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着提出來，而應當離開革命綱領而獨立提出來，這個全時期中，不能為革命要求而鬥爭的羣衆，就要僅僅為民主要求而鬥爭，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後，羣衆意識又「成熟了」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才可以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穆 德

我們試拿這段話同座談會底議論比較看看。座談會或其做結論者會拿民主口號看做是不過動員羣衆用的工具麼？不會！他們不僅沒有這般看法，而且始終沒有說過民主『口號』。他們說的是：民主『主義』，或民主『運動』，或民主『革命』。這是與上面文章所說不同的，那裏，我們祇看見民主『口號』或民主『要求』，並不拿甚麼『主義』『運動』『革命』，同民主相連起來。這並不是說，

論機會主義者之利用民主口號

Ernest Germain

機會主義和教派主義，是革命運動中兩個對稱的傾向，其發生都是由於同樣不瞭解列甯主義戰略和列甯主義策略之間的關係。此外，不幸的，這兩種傾向又能互相助長。過去一切的革命黨中，在反對教派鬥爭過程內，都發生了中央派的傾向，反之亦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間第三國際底歷史不過是此類連貫性經驗之一種悲劇的覆演罷了。我們的運動也不會逃脫此類經驗的。領導者底任務就在於如何細心去教育幹部，爲了防止個別同志付出太多的代價去重覆過去那一切痛苦的經驗，爲了制止傳染病底擴大，當病症終於出現了時候。

教派主義者常常利用列甯主義那些反對機會主義的論據，爲的把他們對於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政策之無知輸入革命運動中來。反之，機會主義者則常常利用列甯主義那些反對教派主義的論據做外衣，來遮掩他們的理論裸體。顯然的，那些論據是決不會減少其正確性的，倘若是一個布爾雪維克黨來使用牠們，即是說，倘若是在一種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行動綱領之下來使用牠們。但如此，革命的論爭者，於解釋一個策略問題時候，就負有責任，來仔細斟酌他的一般論據，爲的向極左派打擊一下時必須跟着向右派打擊一下。否則，他自己就有朝相反方向走得過遠之危險。工人運動歷史教訓了我們，這種危險，對於那些以『反對教派主義』爲專業的傾向和人物，是特別重大的。因爲，我們常說的『教派主義跟隨機會主義，如影之隨形』，這話如果是對的，那麼就有好多人，他們開始向這個影子作戰，不久自己就與最壞的一種機會主義聯盟，來反對革命綱領本身了。

列甯主義者，說到利用民主口號問題時候，是從估量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之一般的客觀局勢出發的，又是從由此估量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出發的。策略的問題不過是關於領導羣衆去接受這個綱領時候必需經過的道路問題，並非關於羣衆尚未『瞭解』這個綱領以前叫羣衆走其他道路的問題！在列甯主義者看來，民主口號不過是動員勞動階級用的一些工具罷了。

機會主義者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號問題。他們說，『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尚未提出議事日程』，或『已退出議事日程』了。最好是『這幾年間不必空談牠』，而應轉向於『更具體的』問題。其次，這些『更具體的』問題切不可時刻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着提出來，而應當離開革命綱領而獨立提出來。換一句話說，在這個全時期中，不能爲革命要求而鬥爭的羣衆，就要僅僅為民主要求而鬥爭，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後，當羣衆意識又『成熟了』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方可以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我們試在歐洲瀏覽一下，就可以顯示大西洋彼岸那些機會主義者；他們的論據每一點都近似於史大林派領袖們底論據，在歐洲大陸上中央派羣中也可以聽到這種論據之忠實的迴聲。

列甯主義對於民主口號之觀念和機會主義對於民主口號之觀念，其間根本的差異可以概括如下：對於列甯主義者，民主口號不過是爲發動羣衆革命行動而用的一些工具罷了，其目的是要創立雙權政制；對於

現在我們不可以使用民主『主義』，民主『運動』，民主『革命』等名詞。這些名詞是可以使用的，但須在一個條件之下，即必須將民主看做一種口號，又將民主口號看做動員羣衆的一種工具，即必須以列甯主義的立場來看民主。如果不把民主口號看做動員羣衆的一種工具，或甚至不把民主看做一種口號，而高談民主主義，或民主運動，或民主革命，那就是『附加一種『真實的進步的』價值於衰頹的資產階級民主之上』了，如下文著者所責斥於機會主義者的。

座談會正是採取機會主義底立場。

參加者和結論者很明白斷言，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現在，在中國，尚未提出於議事日程；斷言，現在不可『高唱』社會主義；斷言，今日在中國祇能參加民主運動，而民主運動切不可時刻刻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着提出來；斷言，現在不可提出社會主義任務，必須等待民主革命成功之後才能提出來。等等。

下文著者說：『凡不肯將民主口號聯繫於鬥爭委員會（按即蘇維埃之別名）口號的人，就不是領袖了，而是運動底絆脚石。』這是說民主口號必須聯繫於蘇維埃。

座談會參加者則說：『此外，有些人認爲目前的民主運動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要組織蘇維埃；——後者是極左的，……是出於同一的小布爾喬亞的幻想。』這是說民主運動中不可組織蘇維埃。

下文著者說：『資產階級民主之臨死掙扎，機會主義者對着，祇想借助一些無效的藥方去拖延牠的生命，列甯主義者對着，則是要借助民主口號來催促牠斷氣。』這是說我們并不要保衛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反而要催促牠斷氣。

機會主義者，則民主口號就成了他們的藉口，爲的無限期地把羣衆革命動員擱置起來，而代之以巧妙的，選舉的，議會行動的，黨團活動的工作，在『羣衆組織』中做這工作。列甯主義者規定現階段性質爲一種宣傳的和組織的準備階段，準備羣衆去從事革命任務；機會主義者則規定現階段性質爲一種『真空』，一種『兩齣戲間的休息時期』，一種必需的『過渡階段』，諸如此類。

羣衆底『民主幻想』

從上述不同的前提就產生不同的結論。在列甯主義者看來，羣衆底民主幻想乃是偶然性的行情性的歷史因素之次要的產物，決不會障礙羣衆革命行動的。反之，我們現在特別能够利用民主口號，正是因爲在資產階級獨裁傾向面前，這些口號能促進羣衆動員去反對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和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就是說，去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後目標！機會主義者則不然，他們認爲羣衆既有民主幻想，那就是表示羣衆將有一個全時期『注目着』議會，將不肯在議會工作範圍以外行動。在機會主義者看來，羣衆既有民主幻想，就不能進行革命行動的了。

過去二年歐洲全部經驗已經證明機會主義者這般提出問題是如何錯誤的了。羣衆跟議會制度（比前都更衰頹的，腐敗的和難換的議會制度）渡過短暫的『蜜月』之後，就到處對於議會內的事情失去一切興趣了。歐洲發生的，沒有一件重要的問題，尤其一件『民主的』問題，羣衆不是自發地採取議會外的行動道路，即胚胎中的革命道路，去解決的。自然，史大林派和改良派要阻止這種行動發生。但是我們的機會主義者，應當解釋一下呀：爲甚麼，由於羣衆『不瞭解』之結果，這些運動必須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以內呢？

當薩伏衣家的翁伯特（譯者按：即意大利國王）遲疑不肯退位時，米蘭工人便要以直接行動來回答他。教派主義者此時如果發出『不要君主國，也不要共和國，祇要蘇維埃』口號，那是有罪的。事實上，那就是等於告訴羣衆說：『人家在那裏準備繩子來吊死你們，你們不必去管牠，你們祇要耐心讀書，等到明白了學問是我們專有物時候，才起來行動。』可是此時如果發出下面的口號：『要求制憲會議迅速行動，叫共產黨和社會黨立即投票罷免國王，等等』，——那就是更加有罪的了。那就是等於摧殘了羣衆底行動的意志，等於把羣衆推回議會範圍內去，羣衆卻是已經走出了這個範圍的。唯一恰當的方式提出問題，就是號召羣衆實行一次總罷工，組織鬥爭委員會，反對翁伯特和君主國，要求共和國；這就是說，號召羣衆起來設立那從民主口號出來的革命政權機關。在此條件之下，凡不肯提出行動口號的人，不肯將民主口號聯繫於鬥爭委員會口號的人，就不是領袖了，而是運動底絆脚石。惡意的機會主義者將要反駁說：『可是，你們自己，與教派主義者鬥爭的時候，也曾堅持指出現階段羣衆在政治上尚未成熟，指出羣衆尚不能自覺地提出進一步爲蘇維埃鬥爭問題。』不錯。但是第四國際底全部任務，正是在於解決客觀革命局勢和羣衆落後意識之間的矛盾，而非在於簡單地提出這個矛盾。閉起眼睛不看這個矛盾，而繼續念誦共產主義經文，（如教派主義者所做的），固然是錯誤的；但是讓自已給羣衆一種過渡性的精神狀態所催眠，不將政治路線建立在幫助羣衆起來担負其歷史使命的任務上，反而降低自己的綱領去適應羣衆中落後層次之次

座談會結論者則說：『在法西斯要取民主主義（按此民主主義當然是上面說的『資產階級民主』）而代之的時候，社會主義也必須為爭取民主而反對法西斯，以便準備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我們必須保衛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才能替社會主義準備道路。

這樣的對比還可以寫出好多，但以上已經足夠證實座談會底機會主義傾向了。

不錯，參加者和結論者有個重要的論據來反駁我們。他們一定要說：下面譯載的文章是寫給歐洲人看的，不是寫給中國人及一般殖民地人民看的。其中所說的話祇能應用於歐洲，不能應用於中國。在歐洲，固然可以將民主看做一種口號，將民主口號看，動員羣衆用的一種工具。在中國則不然。在中國，我們不可以把民主口號看做動員羣衆用的工具，也不可以把民主看做一種口號，而應當看做一種主義，一種運動，一種革命。換一句話說，在歐洲附加一種真實的進歩的價值於資產階級民主之上固然是不對的，但在中國則是對的，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族民主任務尚未完成呀。

這裏，正如史大林主義者一樣，人們是拿中國殖民地或落後國地位來替一切機會主義非惡作辯護。

我們并不否認中國是殖民地或落後國，也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策略應用於殖民地不能完全與應用於先進國一般。但現問題是僅僅在於 Ernest Cerin 同志文中說的『民主口號不過是動員羣衆用的一些工具』這句話是否能適用於中國這個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的。

座談會結論者爲了反駁『新民主主義論』，已經拿落後的俄國和落後的中國相提並論了。這是很對的。他說：『俄國十月革命的例子是最明顯而不

平（如機會主義者所做的），那也是同樣的錯誤。

無產階級革命，其客觀條件成熟性和主觀條件不成熟性，這個矛盾之一種特殊的表現，就是羣衆意識和羣衆經驗間的矛盾，就是羣衆思想方式和羣衆行動方式間的矛盾。意大利無產階級底政治意識水平自然是低於一九二〇年時候，那時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比現在更加普遍，更加爲羣衆所接受的。反之，第二次大戰後，意大利羣衆行動水平則比第一次大戰後更高得多，因爲此次行動於一九四三年開始時就採取了成立蘇維埃和武裝自衛軍形式。羣衆繼續投共產黨和社會黨底票，繼續留在兩黨裏面，這不過表示羣衆未曾陷入於政治的懷疑主義罷了；一旦，行動時候到來，無論是爲了反對莫索里尼的，或爲了反對生活高昂的，或爲了反對君主國的，羣衆行動就更多符合於托洛次基主義綱領，而更少符合於那些出賣階級的『領袖們』底訓令了。自然，這個矛盾一天不得解決，即使有最廣大的最堅決的行動也是預先註定要失敗的。但是，阻礙着道路，使羣衆不能走向第四國際的，並非那些『民主幻想』，實是工人運動之全部過去遺產，實是羣衆對於目前『領袖們』之『革命』作用的幻想，實是惰性和傳統底重重，實是托洛次基派組織之物質上的薄弱，實是我們的活動範圍底狹小，——這一切因素配合起來，就阻止了羣衆，使之不能迅速投向於第四國際歐洲各國支部。我們自己深信，在工人鬥爭現時期中。革命黨將充分迅速而堅定地強大起來，於無產階級未曾被人擊敗以前，就領導之獲得勝利。但要達到這個目的，黨首先必須保持其自己底面貌，其自己的旗幟，切不可同那些替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頌揚的人相混處。

民主口號底代數性

機會主義者，從現階段不可能爲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這一點出發，徹底推論下去，便要說：目前的鬥爭必須是爲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抵禦資產階級的獨裁企圖。資產階級民主之臨死掙扎，機會主義者對着，祇想借助一些無效的藥方去拖延牠的生命；列寧主義者對着，則是要借助民主口號來催促牠斷氣。托洛次基，在與『第三時期』的史大林主義教派作堅韌鬥爭時候，順帶着也指出：問題並不在於保衛『腐朽的魏馬民主』以抵禦納粹攻擊；正是這個『民主』底腐朽產生了希特勒，以後還要產生更多的希特勒。問題僅在於保衛『工人民主』這個核心，牠存在於資產階級『民主』底外殼之內。以這保衛爲跳板，從此由守勢轉爲攻勢，目的在於結果希特勒之後再結果魏馬政制，正如結果了哥尼洛夫夫之後再結果克倫斯基一般。

重覆以上的話好像是多餘的，可是民主口號底『代數性』正可以從以上的話推論出來。當我們努力動員羣衆去反對君主國（這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解體路上的一個障礙物）時候，我們并不告訴羣衆說：資產階級共和國比資產階級君主國『好些』。我們號召羣衆爲之鬥爭的共和國，其『階級性質』是我們有虛懸着的，并非爲了我們認爲能成立一個『既非資產階級的又非無產階級的』共和國，而是爲了這口號恰恰適應於真實鬥爭中的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羣衆已經自覺地向一個障礙物進攻了，卻不明白知道他們究竟爲了甚麼而鬥爭。我們要把共和國口號與整個過渡綱領聯繫起來，以此努力促進他們去瞭解他們的鬥爭底『積極目的』，這就是說，我們要把共和國同一連串其他口號聯繫起來，這些口號都是越出資本主義

可爭辯的。他當時在經濟上是西歐的半殖民地，大工廠礦山和銀行等法都是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土地問題無法解決，迫得向前跳躍一大步，而不能按部就班地走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原來道路。這裏不僅拿俄國看做落後國哩，而且看做半殖民地。這也是對的。

可是當初在俄國，從立憲民主黨到那些『老布爾雪維克派』多年叫囂的甚麼民主『革命』，民主『運動』，民主『主義』，到了實現時候，原來不是別的，正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一些順帶解決的任務，一些要求，一些口號罷了，換一句話說：『動員勞動羣衆用的一些工具罷了。下文著者說：『祇要我們是在衰頹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條件中生活的，則動員羣衆以創立變權政制之任務仍然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對於我們，民主口號不過是解決此任務時所用的許多手段當中的一種手段罷了，——沒有甚麼別的意義。』這話完全能夠適用於當初俄國底革命，可以說正是從俄國革命中抽取出來的教訓哩。

那麼這話爲甚麼不能適用於往後中國底革命呢？半殖民地的俄國能夠適用，半殖民地的中國獨不能適用麼？或者這位結論者對史大林主義者爭辯時不妨承認俄國是半殖民地，對我們爭辯時則否認俄國是半殖民地麼？

座談會另一參加者有幾句話與此問題有關。她說：『在先進國家，民主任務已經完成，所以要直截了當地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但在落後國家，土地問題和民族獨立等任務還未解決，還需要在民主運動中讓廣大的羣衆組織和覺悟起來，向前邁進。』這話無論原則上如何說得過去的，但若拿來反對在中國革命開始時提出社會主義任務，那就大錯特錯了。那就是祇知誦誦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共

社會範圍以外去的。此一階段是甚麼，則將出活的歷史過程自身來決定。如果，在爲『共和國』的鬥爭中，有鬥爭委員會出現了，我們就要拿這些委員會底政權去對抗任何民主共和國；然後我們又要爲『委員會底和國』而鬥爭。如果在這個鬥爭階段，委員會尚未產生出來，那麼我們就要與那鞏固任何資產階級共和國之企圖分開，我們就要向羣衆說明：他們不要在新的商標之下繼續他們的貧困生活。此時羣衆一定會瞭解我們的。但是我們雖然配合着每一階段發出適當的口號，我們仍舊是不可和解地仇視資產階級國家底任何形式的，仇視牠的每一機構的，我們并不隱瞞這個仇視態度，并不藉口甚麼『策略』來遮掩牠。

反之，機會主義者，當援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時候，當鄭重提示資產階級共和國『較優於』君主國，或一院制國家『較優於』兩院制國家時候，就是明白顯示他們的思想底來源了。不錯，當討論憲法問題時候，我們必須時刻把最急進的最進步的解決法提出來，向羣衆解釋，讓羣衆知曉，正如當討論軍費預算時候，我們必須批評種種細目，要求縮短軍役期限，增加士兵薪餉等等；但這并不阻止我們排斥整個的資產階級憲法，正如我們始終排斥整個的軍費預算案，不管其中採納了甚麼『革新方案』。

固然不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共和國之下比在君主國之下，在一院制之下比在兩院制之下，都『更容易』發展些。但現在提到無產階級面前來的問題，并非挑選一個『容易的』和理想的『框殼讓牠在其中鬥爭的問題，而是自衛問題，而是保衛自己的階級生存以抵禦貧困，失業，法西斯和戰爭所招致的災害問題。這些災害，這些加於無產階級頭上的災害，是從一個本源生出來的，即從資本主義衰頹生出來的，無論在意大利君主國中，或在西班牙共和國，無論在兩院制國家（如戰前巴爾幹諸國）中，或在一院制國家（如戰前德國）中，都是一樣。在衰頹的資本主義時代，即使創立一些不同的框殼，仍是不能避免災害的。若有人祇爲創立這些不同的框殼，而號召羣衆起來耗費其寶貴的精神，那就不配稱爲革命者。列寧主義底特性就在於原則上堅定，而所採取的策略無論如何富於伸縮性，仍是有原則的策略。反之，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則經過幾次『策略的』跳躍，就走出革命綱領以外去了。

機會主義者既然附加一種『真實的進步的』價值於衰頹的資產階級民主之上，而把民主口號看做一種議會式的綱領，爲了獲取羣衆底選票或同情，而不看做發動羣衆行動的手段，那麼最後他們自然要拋棄無產階級底政治獨立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列寧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之差別表現最清楚。對於列寧主義者說來，基本的戰略仍舊是階級鬥爭戰略。民主口號得到一種新的重要性，僅僅在其幫助革命黨去動員羣衆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限度內，僅僅在其爲補助的手段以擴大工人和資本家間思想鴻溝的限度內，這種手段之重要，我們是第一認識的，——同時也在於牠能暴露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全部的罪惡，其中最可恥的一個就是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之公然消失。但所有這些要能發生作用，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即民主口號必須放在反資本主義的公開宣傳和鼓動之中，無產階級必須保持其政治獨立性，必須堅決攻擊資產階級，視之爲應替各種自由之消失負責任。

反之，機會主義者則是從分析一種『退兵』或一種『未成熟』出發的，他們看無產階級不過是爭取『最基本民主』的『各種民衆』間一種空泛的『士敏土』罷了，同時他們閉口不言這些民衆底階級性。他們不說起資產階級底罪惡，資本主義底罪惡，他們叫羣衆行動去反對某一替罪羔羊，如外國『帝國主義』，

產主義經久，而閉眼不看客觀世界底發展。

祇要留心這十幾年事變的人就會明白，世界愈變愈小了，各部分關係愈變愈密切了，單獨一國的革命愈變愈不可能了，落後國或殖民地革命也愈變愈能適用一般的法則了。他方面，先進國，例如法國和意大利，現在果真能够『直截了當地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麼？倘若歐洲諸先進國能够『直截了當地提出社會主義的任務』，那麼下面那篇文章根本就不必寫了。Ernest Germain 同志所以需要打擊機會主義傾向，正是爲了現在局勢的特點，即革命局勢和羣衆意識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任務并不能『直截了當地』提出來，必須假借民主口號這種工具。十幾年前那個公式，以爲已經完成民主任務的先進國無需提出民主口號，而尙未完成民主任務的落後國決不可提出社會主義口號，至少一開始不可提出這種口號，——這個公式真應送進古物陳列所裏去了。今天，Ernest Germain 同志給了我們一個新公式，將先進國和殖民地包含在內的公式，即說：『布爾雪維克派底辯證法……表現了當代歷史底基本法則，即配合發展法則。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現在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也是要經過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但是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後的國家也祇有無產階級勝利和資本主義推翻才能實現。』

由此可見，借助於中國殖民地地位來替中國的機會主義傾向做辯護，是徒勞無功的。

下文著者又告訴我們，教派主義跟隨機會主義如影之隨形，打擊了機會主義之後也必須打擊教派主義。在民主口號問題上，教派主義是怎樣說的呢？著者說，教派主義認爲現時代不可使用民主口號，民主口號本身便是要不得的，民主口號加強了民衆底民主幻想，不該偏愛民主口號過。蘇維埃，應

『反動』或國王。在這時代，連落後國和殖民地底資產階級也不能爲最低限度的『民主』而鬥爭哩，祇能趁羣衆無力抵抗時在外國帝國主義卵翼下建立其最野蠻的獨裁哩，此時機會主義者竟企圖在帝國主義國家本身內尋覓資產階級『同路人』，竟以爲這些『同路人』是向着『真正的民主』走去的。在衰頹的資本主義時代，圖謀將資本家（他們要求『自由地』剝削工人）和工人（他們要求廢除一切剝削）團結在同一旗幟之下，那正如過渡綱領所說的，是要將民主口號轉變爲一種繩圈去吊死無產階級的。實際上，這個『繩圈』體現爲一種『同盟』或一種『陣線』或一種『人民運動』，人們奉此名義邀請無產階級與牠的階級敵人聯合一起，來『保衛民主權利』。向那些自稱爲『托派』的『革命者』覆述以上粗淺的道理，是很不愉快的事情。……

機會主義和教派主義

教派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在民主口號問題上所用的推論方法，其對稱性是非常顯著的。在教派主義者看來，『現時代』不可以使用民主口號；在機會主義者看來，『現時代』政治上祇可以使用民主口號。在教派主義者看來，民主口號本身就是要不得的；在機會主義者看來，民主口號本身就有『進步性』。在教派主義者看來，民主口號『加強了』羣衆底民主幻想；在機會主義者看來，民主幻想又抬高了民主口號身價，使得『暫時』無革命可能。教派主義者責列甯主義者不該『偏愛』民主口號過於蘇維埃；機會主義者則責列甯主義者不該『聯繫』民主口號於蘇維埃。在教派主義者看來，任務在於『先教育羣衆』，同時避免行動；機會主義者，根本上，重覆同一思想，但他們并不提出一種解毒劑，而建議一種『免疫法』，即要羣衆屢犯錯誤，來『教育』羣衆。事實上，教派主義者要走入書齋去；機會主義者要走上議會演說台去。如果來不及了，二者都要以自己的罪過指責羣衆的。二者都很自滿，都要指責羣衆無能瞭解一種『聰明的』策略，都永不會從事變學得甚麼。

這些機械的，圖式的思想，是教派主義和機會主義所共有的，卻根本違反布爾雪維克派底辯證法，這辯證法表現了當代歷史基本法則，即配合發展法則。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現在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也是要經過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但是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後的國家，也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勝利和資本主義推翻才能實現。

然而，人民僅僅知道現實中有矛盾的因素存在，那還是未能超出思想上經驗階段以外去的，——許多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起源於這個思想階段的。須待思想能在無量數的矛盾運動表皮下發現出根本傾向時候，馬克思主義方才開始。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最前進的國家，也認識民主口號底重要性，當這些口號被納入於過渡綱領整體內時候。所以馬克思主義者須將這些口號隸屬於整個綱領，如同人們將一種補助性的任務隸屬於一種基本性的任務那樣。所以馬克思主義者認識這些口號底插話性和過渡性，認識牠們能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從羣衆運動之發動機轉爲羣衆運動之制動機；他方面，祇要我們是在衰頹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條件中生活的，則動員羣衆以創立變權政制之任務仍然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對於我們，民主口號不過是解決此任務時所用的許多手段當中的一種手段罷了，——沒有什麼別的意義了。

當教育羣衆而避免行動，等等。

機會主義傾向如果發展下去，將來難免產生教派主義傾向，可是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

可是機會主義者已經在向他們的『影子』作戰了。同一座談會說：『有一種極左派認為中國將來可不經過民主革命的橋樑就飛躍到社會主義。』又說：『另一種人則乾脆不要這橋樑而空喊社會主義。』這個『極左派』，這『另一種人』，究竟是誰呢？在甚麼地方說過這種話呢？我們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現在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也是要經過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何況在落後的中國？恐怕還沒有人否認民主口號或民主要求罷？精神病院裏有一種病人害怕自己的影子，我們的機會主義者也許就是這樣一種病人。不過他們在那裏大張撻伐的還不是他們的影子哩，還不是真實的教派主義者哩，而是他們虛構的教派主義者，可以說是教派主義者底影子，即他們的影子底影子。他們是雙料的精神病者，害怕自己的影子底影子。

把民主看做一種口號或一種要求，把民主口號或要求看做不過是動員羣衆用的一種工具，去爲建立雙權政制而鬥爭，——這便是托洛次基主義者在民主問題上與機會主義者或教派主義者分別之點。

這次大華飯店聚餐，最明顯表白了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態度。牠公然開了價，而且開了很廉的價，外國人付出了此價以後，牠就公然進行抵抗工人運動了。牠自覺地布置牠的聯合力量，而且在一切行動之中，愈來愈加自覺，愈加機警，愈加審慎了。牠的影響決不限於上海和北方，而是一直達到國民革命運動中心廣州的。

那些頭腦簡單的中外有錢人，每次抬頭向廣州望時，除了『赤化』之外，看不見甚麼。其他的，較聰明的人，則開始覺得那裏的實際情形，與人們想像

中國革命悲劇

(續)

Harold R. Isaac 著
唐 威 譯

有一位夾纏二先生，在一次座談會上，爲了說明民主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如何如何重要，便引經據典，像煞有價事地說道：

『所以，列甯在『叛徒與考茨基』一書中說：『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成熟的標幟』。』

這裏所說的『列甯』，不知道是誰？如果是符拉底彌爾·意理趣·列甯，那麼他從未曾寫過一本叫做『叛徒與考茨基』的書。他祇寫過一本叫做『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的書，一九二九年中文翻譯出版時曾改名爲『革命與考茨基』，但從未會有個版本名爲『叛徒與考茨基』，也不可名爲『叛徒與考茨基』。

就算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被這位先生夾纏去了罷，但我們翻遍全書，無論如何找不着列甯曾說『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成熟的標幟』這句話。

書中，不錯，列甯曾徵引恩格斯說的一句話：『普選制爲無產階級成熟的指標』。這裏有『成熟』，又有『指標』，但說的是『普選制』，不是『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不是『社會主義』，而且說的人是恩格斯不是列甯。

就算是這句話被這位先生夾纏去了罷，但列甯引了這句話之後繼續引下去：

『普選制爲無產階級成熟的指標。牠在現代國家中不能再給更多的東西，也永不會再多給甚麼東西。』

這繼續引的幾句話旁邊，即從『牠』字以後，列甯還加上了着重點。列甯說道：

『這個論點的第一段（按即指『普選制……』一句）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考茨基先生非常乾燥無味地加以阻嚼。至於我們加上着重點，爲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第二段（按即指『牠』字以下二句），叛徒考茨基就默不作聲了。』

我們的夾纏二先生也默不作聲了。我們的夾纏二先生徵引這句話，原意是要來說明民主主義對社會主義是如何如何重要的，但恩格斯說這句話和列甯引這句話，原意恰是要來說明民主主義對於無產階級如何有有限制性，如何除了普選制外不能再給更多的東西，而且永不再多給甚麼東西。事情如果祇限於夾纏，那還不過顯出冬烘先生底本相，但若是爲了偽造經典以便於私圖的，那就未免太那個了。

的并不一樣。在那困難的幾個月，外國人學了不少的乖，其中最聰明的，很快就明白了：問題并不是他們使用武力所能解決的，而須依靠那運動中的階級分化。那運動似乎是要妨害他們的利益的。一個外國人寫道：『外國人之嚴重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過分地把赤化視爲一九二五年一切紛擾之原因。……人們如果繼續把『反赤』和『親外』混爲一談，那就很少希望中國人那些較好的分子能起來真正反對共產黨。』（見一九二六年 China Year Book: P.1011.）中國政客之流，與外國人結合了新關係的，一定會告訴這些較遲鈍的盟友說：

廣州并不是「種票顏色」，而是「撲滅了階級發光鏡」的各種顏色；如果要把幕上紅顏色除去，那就必須極端小心去割裂這分光鏡。

因爲，在廣州，這接近羣衆運動的城，階級對立表現得最尖銳。國民黨老右派已經分裂出去了，因爲他們認爲聯共妨礙了他們與列強妥協。但在廣州，所謂「左派」，即那些敢於使用危險武器的人，則與右派相反，則認爲羣衆運動能替他們撐腰，去同帝國主義做買賣。他們認爲共產黨就是一種現成的工具，可以用來實行這個政策。結果是羣衆力量被大規模組織起來，而國民黨在廣東省的統治也穩固了而且強大了。但是這個運動起來，就很尖銳地把領導權問題提出於論事日程。必須保證這個羣衆運動始終受資產階級所操縱。由於共產黨底默認政策，羣衆運動底領導權遂不經流血而落入資產階級手中了。要知道這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祇需在廣州政治生活內種種陰謀和個人衝突中尋得一條線索就够了。這線索就是蔣介石發跡史。

蔣介石是那種歷史人物之一，他們從本階級中出來，領導了本階級，因爲他們的個人野心，他們所處環境，與歷史的發展，配合起來，恰好使得他們於一定的歷史時期，替他們本階級底需要服務。恩格斯所謂「無量數偶然性之湊合」，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命運」，因爲其中聯繫太繁複了，常常弄不清楚。這種「偶然性湊合」，當本階級需要時，就把上述的歷史人物推向前來了。他們追求他們的目的，不管所追求的是世界改造，或是「已權力，財富或『面子』」，他們總是實現着他們的時代對於他們之要求的。他們乃是社會階級鬥爭所織成的大圖案中一個部分，但是他們也幫助去決定那不斷形成新圖案之花樣和顏色。在他們的生活上，表面好像是許多偶然性之積累，其實，最後算來，都是符合於不可逃避的歷史必然性的。蔣介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野心，連同他的詭詐和計謀，現在推送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心了。

他出身於浙江一個富商家庭，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爆發時，他在東京士官學校讀書，他急忙趕回上海來，在陳其美將軍參謀部中服務。由於陳將軍底介紹，他結識了孫文。他又結識了買辦處洽卿和富商張靜江，——後者在巴黎開古董店和豆腐店發了財，擴大了祖傳財產。……（此處刪去數行）……上海這個潮金地似乎很適合蔣介石的胃口；有一個時候，他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做一個小經紀人。不知道是由於太貪心呢，還是由於外行（各種史料，對這問題都沒有明白的解答），他不久就沒有了一個錢了。張靜江和他的別的保護人，幫助他脫離這個異常困難的境地，替他還了幾筆債，給他路費，送他到廣州去，把他的命運跟孫文底命運聯繫一起。古今投資很少看這般消息的了。

孫文同蘇維埃政府取得聯繫之後，就派蔣介石，他的一個參謀，到莫斯科去，爲了研究紅軍和蘇維埃制度。蔣介石於一九二三年七月離開中國，在俄國住了六個月。莫斯科很少有人注意這位中國青年軍官，他的冷靜的珠一般的黑眼睛也許預告着能做出大事業。他是從那個被雇傭軍隊所蹂躪的國土到這裏來的，他看見了紅軍底士氣和方法一定會驚奇不已。他看見了一支從革命和內戰興起來的人民軍隊，又知道了這軍隊和羣衆間的種種聯繫。他看見了幾千萬人民，不久之前才解除了枷鎖和脫離了愚昧。這種偉觀曾引起他的願望，要幫助他自己的國民也解除幾千年的枷鎖麼？——他往後的生活中心沒有一點能拿來證明，他不過把他所見的當作資本記在他自己帳上罷了。也許他見到了一種思想有何等的力量，居然能令人貢獻無限的犧牲和忠誠。首先，他見到了羣衆底力量，作爲一種政治的和軍事的武器。蔣介石便是這般回到中國來，他獲得的智識給了他一種很大的便宜，超過於同輩的軍人。祇要對他有利，他現在就可高喊「世界革命萬歲」了。他曾看見這口號鼓舞了幾百萬人。他希望用這口號來建立他自己的權力。他的深藏的階級本能警告他說：這是一場危險的賭博。但是蔣介石正是一個賭徒，他把賭注放在桌子上，大胆地擲下去。

蔣介石年終回到廣州後，便受鮑羅廷及俄國諸軍事顧問所垂青。一九二四年五月，黃埔軍官學校在俄國扶植之下用俄國基金創立起來時候，蔣介石爲了是唯一的高級軍人，會到過蘇聯，又會親眼看過紅軍訓練方法的，自然被選任爲校長了。黃埔孕育了中國新型軍人，也孕育了蔣介石底政權。全國優秀的青年人紛紛到黃埔來，後來優秀的革命戰士也有不少是從黃埔出身的。但是羣衆運動底高漲，工會和農民協會權力底興起，不久就在黃埔學生當中劃了一條階級分水線。初期，在鎮壓廣州商團時候，在出征東江時候，在削平楊劉時候，在南征時候，黃埔學生都是在最前面作戰的。蔣介石是他們的軍事領袖，每次戰役都抬高了他們的威望，權力和影響，尤其在學生畢業出來充當各軍事單位軍官以後。（未完）

本刊從每月二期改爲一期，而篇幅不能增加，以致有些文章爲了容納不下，祇好割愛，例如本期，有一篇長春通信和若干則國際鬥爭消息，都不能登載，『中國革命悲劇』也祇能登載一點點。這都是爲了短缺印刷費原故。上期向讀者呼籲之後，已有幾位慷慨解囊了。但離我們的需要尙遠。望更多的讀者能給予援助。